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梁启超



一、时代与家世

中国近代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创造英雄业绩的时代。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祖国母亲的独立富强，1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从各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不屈的斗争。1873年2月23日，祖国母亲的又一个优秀儿子诞生了，他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思想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甫，又号任公和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人。梁启超出生的年代，正是世界和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从世界来说，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英、美、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把殖民主义伸向世界各地。在中国，一面是满清封建王朝正处在由盛转衰的下坡路上；但另一方面，受内忧外患的刺激，出现了一批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还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一场社会变革的风暴，正在酝酿形成。

梁启超家乡茶坑村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这是一个依山濒海、地势低洼、气候炎热、土地瘠薄的穷地方，乡民们大多以伐薪烧炭，耕种捕鱼为业，常年过着贫困的日子。但梁启超家乡所在的广东省，则是中国近代开通风气最早的地方。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她首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首先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和洗礼。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4位先进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除严复外，都是广东人。由新会而东，不到100华里，便是伟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生的地方——香山县（今中山市）。由新会渡江而北，约100华里，为南海县（今南海市），那里的银塘乡苏村，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故乡。再由南海县越广州渡珠江而北约50华里，便是著名的广东省花县（今花都市），这里是领导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杰出领袖洪秀全的故乡。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使得生活在茶坑村这一穷乡僻壤的梁启超得天独厚，能有机会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能及时地呼吸到时代的气息。

梁启超的家庭在当时的茶坑村既称不上富贵，但也不算贫困。梁启超祖父名维清，号镜泉，生于1817年，卒于1892年。他是梁氏家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秀才，曾做过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教谕。但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他不久便辞职回乡执教，并购得十几亩地，过起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成为一个典型的乡村士绅。据传，梁维清生前乐善好施，热心本村的公益事业。他见村中道路失修，便率先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村里修路。他还谙熟医理，常替乡人诊病，遇到贫穷的病人，他不但不收诊金，还免费赠药，深得村民的爱戴。

梁维清在家庭里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他除在自家空地上亲自筑一小书斋，供诸孙读书识字外，平常特别注意引导儿孙树立忠孝观念。茶坑村有一座古庙，构筑精细，风格典雅，内藏40多幅古画，另挂有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24位忠臣图像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24位大孝子的肖像画。每当元宵佳节，庙内灯火通明，彩带飘舞，百姓在赏灯之余，领略这些名臣、孝子的忠孝精神。梁维清把这种节日观光看作是教育子女的一个很好机会，每年正月

十五必带子孙进庙观画，一一向他们指点讲述，曰此乃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乃岳武穆出师北征也……鼓励诸孙立志以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为榜样。

梁家祖坟葬在崖山，这里濒临大海，石厚土薄，是南宋末年与蒙古铁骑战斗的古战场。当时南宋皇帝赵昺被逼得走投无路，大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击元军，最后因粮尽援绝，陆秀夫为不做元军的阶下囚，先将爱妻推入海中，再背着赵昺投海自杀，演出了南宋灭亡时极为悲壮的一幕。对于这些民族英雄，梁维清极为钦佩。每当清明时节，他必带上全家，划一小舟，前往崖山扫墓，一祭奠祖先，二凭吊南宋灭亡时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寄托对忠臣赤子的哀思。当船行至崖山附近时，梁维清总要触景生情，不禁又向儿孙讲述起他们早已熟悉的南宋故事，并高声朗诵起陈独漉“山木潇潇”的诗句，当朗诵到“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时则提高音阶，作悲壮之声，弦外之音流露出对清朝满州贵族统治的不满。梁维清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使梁启超从小受到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梁启超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涧，人们常习惯地称他为“莲涧先生”。他生于1894年，卒于1916年，是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莲涧先生在科场上很不得意，屡试不第，30岁以后便绝意仕途，教授乡里，靠着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六、七亩田和教书所得，继续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在待人处事上，莲涧先生则秉承父风，勤奋、俭朴、自尊、自信、律己严，待人宽，在乡邻中间也颇有威信。村中的大小事务，乡民们常推他去处理。而莲涧先生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维持茶坑村的社会安宁。如组织乡团对付盗匪，保护乡民财产，亲自出面调解村族间的械斗，在村中实行禁赌等等，这些措施都深得村民的称赞和拥护。在家教上，莲涧先生由于自己未能搏取任何功名，因此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对梁启超要求也特别严格。他除教梁启超读书作文外，还教导他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他常教导梁启超，为学的目的，在于修身济世。为不使梁启超染上游手好闲的纨绔之习，败坏勤俭节约的家风，莲涧先生要求梁启超在读书之余，必须参加劳动。他一再告诫梁启超不能以普通孩子要求自己，要从小立志做一个不平常的人。

梁启超的母亲赵太夫人，也不是一般的农家妇女，她出身书香世家，知书识礼，在茶坑村以贤孝闻名乡里。有关她当时在村里的名望，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凡是曾跟赵太夫人学过识字和针线活的本村女子，订亲时，她的品性和德行就不再会被人怀疑，被认定是个好女子。赵太夫人是一位十分称职的母亲，她一共生过4个儿子，2个女儿。长子便是梁启超。次子启勋，字仲策，比梁启超小4岁。三子只活到5岁便夭折。四子名启业，比梁启超小15岁，赵太夫人则因生第四子难产而死。赵太夫人生前除了生活上给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外，还做了孩子们最好的启蒙老师，教他们读书识字，引导他们做正派人。梁启超6岁那年，有一次因某事说谎，赵太夫人发觉后，生平第一次在孩子面前动怒，令梁启超跪下，力鞭十几下，然后用通俗的道理讲了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说谎。她说，一个人说谎的原因，不外乎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是应该做的事而没有做，这两件事本来就是错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还有情可原，但自知错了，还要说谎，自欺欺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终究不会被人相信，到头来只有做窃贼、乞丐的行当；天底下的坏事，都是从说谎开始的。

梁启超就是这样在祖父和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他后来的性格、思

想和为人也都流露出孩提时代家庭影响的痕迹。

二、少年得志

历史上成名的大人物，有的是少年得志，有的则是大器晚成。梁启超属于前一类人物。他在家庭的良好教育下，自幼聪明好学，反应敏捷，被人们称为岭南神童。

5岁那年，普通孩子连字都还不会认，梁启超却在祖父和母亲的指点下，读起《四书》、《诗经》。到七、八岁时，他除跟家人读书识字外，还拜张乙星和周星吾为启蒙老师。在塾师的热心训导下，他的学业进步得更快。有关梁启超少年时代卓然超群的才华，新会一带迄今仍流传着许多故事。据说7岁那年，有位长辈来他家作客，启超上前奉茶，客人为试一试他的聪明，出了一名新会俗语“饮茶龙上水”命他对下句，梁启超居然不假思索，也以新会俗语应答道：“写字狗扒田。”客人见用新会俗语没有难倒他，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对，想不到梁启超又随口答以“南国怀召伯棠”。一问一答，使得这位客人连连点头，称道他的确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学童。还有一次，梁启超在他父亲的朋友李兆镜家中作客，李以“推车过小陌”叫他对，梁启超脱口便以“策马入长安”相答。其对句之工，气魄之大，又令在座惊叹不已。

梁启超还从小喜爱独立思考。在他家乡一座小山上有一建于明代的凌云塔，雄伟壮观。立于塔旁，珠江三角洲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南海潮的冲天巨浪，也隐约可见。梁启超常来这里玩耍，登塔远眺。8岁那年，有一次，他又独自一人来到凌云塔，仰望变幻无端的蓝天白云，产生无数奇异的想法，但一时又不得其解，于是作了这样一首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责问苍天、责问孔子的诗。其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颈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化，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梁启超的祖父看见这首诗后，立即对他严加训斥，说：“你敢冒犯苍天、孔子，大逆不道。”也就在这一年，家里人开始让梁启超学作八股文，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

在科举的道路上，梁启超果然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他很快掌握八股文的技巧，第二年就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好文章。1882年，刚满10岁，梁启超便在祖父和父母的嘱咐下，前往省城广州应童子试，以便跨上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当时，与他一同前往广州应试的都是一些比他长二三十岁或四五十岁的兄长、叔伯。他们合雇一条船，由新会沿西江而上。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两三天航程，一天中午，大伙儿舟中共餐，米饭加咸鱼，有人忽然提议大家以咸鱼为题吟诗作句。当满船学子还在苦思冥想之际，梁启超却从容地做了一首十分切题的“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的诗句。其诗一出，立刻博得众人一片喝彩。这就是至今还在新会一带广为流传的梁启超舟中吟诗的故事。

这次考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考上，但收获还是不少。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热闹的省会，使他看到了广州这个与茶坑村乡土社会迥然不同的都市社会风貌，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回到家里后，梁启超更加勤奋地学习。

两年后，也即1884年，梁启超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第二次赴广州参加

府试。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梁启超终于考中了秀才，补了博士弟子员。这一年，梁启超才刚满 12 岁。他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达到了他祖父的功名，实现了他父亲一生都没能实现的愿望，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梁启超在学习上的悟性之高、进步之快，令两年前教他读书的周星吾先生也自忖学识有限，不久便主动辞教而去。

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聪慧，不只表现在读书上，而且在举止行为上，也显得格外早熟。他在考上秀才之后，想想自己一直深得家庭大人的钟爱栽培，尤其是想到正躺在病榻上的祖父，光宗耀祖的思想油然而生。当广东学政叶大焯接见考取的士子时，稚气未脱的梁启超大着胆子，俨然以成年人的语气，跪请学政大人为他的祖父镜泉先生 70 诞辰题写寿言。身为清朝三品大员的叶学政为梁启超的孝情和聪慧所动，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提笔写下一段长长的祝寿文，称赞梁家教子有方，鼓励梁启超继续努力读书，显亲扬名。当梁启超将那副庆贺寿文悬挂家中时，躺在病榻上的镜泉先生感慨万千，感到莫大的安慰。茶坑村的男女老少得知后，也络绎不绝，前来道贺。有关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这段故事，曾长久地流传在家乡新会，为乡间父老所津津乐道。

考中秀才，根据清朝的制度，也就获得了进入官立学校读书的资格。依照这一规定，1887 年梁启超进入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继续深造。学海堂为清朝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所创，是一所专门讲授词章训诂的学堂。梁启超勤奋好学，很快成为全校的一名佼佼者。他进学海堂的第二年，就取得专课生资格，写出一篇万余字的《汉学商兑跋》。在第三年专课生季课大考中，梁启超又取得四季名列第一的好成绩。据说学海堂自建校以来，只有两个人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一个是被称为“江南才子”、戊戌变法期间力主革新的翰林学士文廷式，另一个就是梁启超。但梁启超并不以此为满足，为吸取更多的知识，他还去菊坡精舍和粤华、粤秀书院听课，以取各家之长。课余时间，他又利用学海堂赏给他的奖银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如《四库提要》、《二十二史》、《百子全书》、《知不足斋丛书》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学海堂的三年里，梁启超系统地接受了有关词章训诂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为他后来的学术文化活动打下深厚的功底。

1899 年，17 岁的梁启超再次表现出他卓然不群的才华。这年 9 月，他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中举人，并榜列第八名。不但如此，这次科举考试的成功，还给他带来另外一桩喜事。这次广东乡试的主考官是李端棻，他对梁启超的才气留下深刻印象，认定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于是便托副考官王仁堪做媒，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但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先生因自己是寒门之家，实在不能和世代为官的李家匹配，婉言谢绝。为此，李端棻又专门派人前往梁启超家里做解释说服工作，告诉莲涧先生，自己只重人才，不重门第，梁启超目前虽为寒士，但决非一般人物，将来必有飞黄腾达的日子，希望莲涧先生接受这门亲事。就这样，在李端棻的撮合下，梁启超与比自己大 4 岁的李蕙仙订了婚。

一夜之间，梁启超既获功名，又得爱妻，这在许多人眼里，意味着梁启超将官运亨通，前程似锦。但刚刚踏上人生旅程的梁启超，并没有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赞扬所陶醉，更没有因此去追求宋代以来即在封建士大夫中流行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陈腐的人生格言。相反，他不久就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功名利禄背道而驰的人生道路。

三、拜康有为为师

在梁启超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康有为是一位关键人物。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因此人们常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康有为虽然出身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在中国近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的时候，富有远大理想的康有为萌发了救国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1888年，他利用赴北京会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清朝光绪皇帝，提出维新变法，御侮图强的要求。1889年回广东后，康有为继续宣传维新思想，开设学堂，培养变法人才，建立维新大军。

梁启超初识康有为是在1890年。这年8月，他在广州碰到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通甫）。叙谈间，陈千秋第一次向他说起康有为的情况。听了陈千秋的介绍后，梁启超当时觉得很新鲜，于是便跟着陈千秋，带着好奇的心理，一起去拜谒康有为。见面后，康有为毫不客气地批评梁启超从前所学的旧学问都是一些陈腐无用的东西。这次谈话从上午七、八点钟开始，一直谈到晚上九、十点钟。梁启超深深的被康有为那套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所吸引，觉得康有为那些话有如冷水浇背，给他当头一棒，当晚回到学海堂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整整思索了一夜。第二天，他又去见康有为，决定脱离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扬中外的政治革新家，同时又是一位知识渊博、思想活跃的教育家，他办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变法来指导教育，用教育来辅助变法。因此，他开设的万木草堂，从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以及招生对象，都与当时的学海堂和广州其他几个书院不同。在教学内容上，草堂以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为学规，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智育方面，草堂设置的有些科目看起来和学海堂差不多，但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如草堂设置的义理之科有泰西哲学；经世之科有政治原理学和政治实用学，中国与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社会学。考据之科有万国史学、数学、格致学等；文学科有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些都是梁启超过去在学海堂中没有接触过的。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要求学生勤俭节约，懂礼貌，尊敬师长，爱护童幼。此外，还特别向学生提出“四耻”即耻无志，耻徇俗，耻鄙吝，耻懦弱。康有为解释说，这种严格的道德修养，目的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有了这种气节和精神，才能胸怀大志，不图个人荣华富贵，见义勇为，肩负起变法图强的重任。

在体育方面，草堂设有音乐舞蹈、体操、射击等科目，每两天上一次体育课，并将体育与习礼、音乐、舞蹈紧密地结合起来。康有为在草堂内专门设一乐器库，存放各种乐器和习礼器具，每逢初一、十五举行祀孔典礼，组织学生进行歌舞。此外，他还组织学生郊游，与学生一道到市内风景优美的地方游览、散步，遇年假，则赴外地游历。这些活动十分迎合青年人的天性，既可增强体质，调节精神，又达到陶冶情操，寓教于乐的目的。

草堂招收的学生，都是一些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他们年青活泼、感情奔放，有着共同的志向和抱负。因此，在草堂内，师生和同学之间亲如一家，团结友爱。学生尊敬老师，老师也爱护学生，视门生如子侄。至于同学之间，则更是亲密无间，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互相帮助，彼此关心，相待如兄弟。对于草堂内的学习和生活，梁启超晚年作过深情的回忆，称在万木草

堂学习，没有一天不快乐的。

在万木草堂的众多弟子中，梁启超又是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与陈千秋最早来执弟子礼，曾担任学长，负责向后来的同门弟子介绍万木草堂的读书方法，被康有为视作当代贾谊，寄予莫大的希望。在草堂读书期间，梁启超不但最早得闻康有为当时还秘不示人的《大同书》，而且还与其他弟子一道参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编写工作。这两部著作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的重要作品。《新学伪经考》一书断言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左氏春秋》、《逸礼》、《毛诗》、《书经》等，都是两汉末年的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汉而谬托圣人制造的“伪书”，根本不可信。《孔子改制考》则将孔子捧为一位矢志社会改革的通天教主和为万世作法的“素王”，同时提出“通三统”、“张三世”的进化论的历史观。通过参与这两部分的编写，梁启超从中更深入地掌握了老师的思想理论，更加坚信改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后来将这两部书分别比作晚清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和“火山大喷火”，形容它们所产生的巨大思想威力。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学问的一大转变，也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康有为这位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大师的教育和启蒙下，梁启超也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万木草堂读书期间，他常与要好的朋友纵论天下大事，思考如何推动国内变法。1892年，他在写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提出要变法，首先要兴办铁路。梁启超指出，目前社会对新生事物百般敌视，原因在于风气不开，人们孤陋寡闻，对世界一无所知；一旦兴办铁路，这种现象即可得到改变。因为道路畅通了，人们的见闻扩大了，就不会再反对变法。1893年冬，梁启超又与万木草堂的另一位弟子韩文举一道前往广东东莞讲学，宣传康有为的今文经学，阐述维新变法、改革社会的必要性。他的讲学，使东莞学子们思想为之一新，开始知道所谓人类公理、国家思想等是怎么一回事。

1894年，梁启超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年的春夏秋间，他与夫人李蕙仙客居北京，与一批同情和倾向变法维新的人士广为结交，如夏曾佑、麦孟华、江孝通、谭嗣同等，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提倡新学，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火药的气味已经弥漫在北京城的上空，但清朝统治阶级视战争如儿戏，根本没有把战争放在心上，仍在京城歌舞不休，寻欢作乐，忙着为庆祝慈禧太后的60寿辰大修颐和园，布置“万寿点景”。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梁启超更增强了变革的紧迫感。他在这时写给好友夏曾佑的一首诗中，劈头就长歌当哭，强烈谴责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人民涂炭，道德沦丧，学术凋敝，有志之士遭压制，报国无门，万马齐喑，号召有志之士赶快行动起来，实现变法救国的伟大理想。梁启超这首诗这样写道：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阍呼不闻，高谈复何益！

不但如此，梁启超在京期间还就《新学伪经考》毁版案一事，首次与顽固守旧分子展开较量。这年的8月3日，一个名叫余联沅的封建卫道士上书弹劾康有为，要求朝廷销毁在社会上极有影响的《新学伪经考》一本，并禁止康有为在广东讲学。清朝顽固派总头目慈禧太后批准余的上奏，下诏令给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要他查办此事。梁启超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他一面将消息通知康有为，让他作些准备，一面利用旅京之便，托沈曾植、曾广钧、黄绍箕、文廷式、张謇等同情维新派的名流，向广东学政徐琪、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等清廷要员疏通关节。在梁启超的奔走活动下，李瀚章最后令康有为自行销毁其书，了结此案。梁启超在这场政治风波结束后于11月离京南归，等待维新运动机会的到来。

四、投身维新运动

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既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一年，也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拉开维新运动序幕的一年。

早春3月，梁启超结束他在万木草堂的4年学习生活，与老师康有为同赴北京参加全国3年一度的举人会试。但到北京后，梁启超来不及复习迎考，便被《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条款所惊骇。在得知条约中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两白银的内容后，梁启超万分愤慨，与其师康有为当即决定发动在京举人上书拒签和约，决不能让日本侵略者和中国主和派的阴谋得逞。事情商定后，梁启超先找自己熟悉的广东举人做工作，后又向夙有经世传统的湖南举人游说。4月22日，梁启超成功地组织粤湘两省举人共同向都察院呈递拒和请愿书。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的带动下，其他省的举人也纷纷响应，愤然上书。特别是台湾省的举人听说和约中有割让台湾全岛给日本的条款，更是怒不可遏，他们站在抗议队伍的最前面，表示要和倭寇血战到底，决不做亡国奴。

士人们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给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巨大鼓舞。在康有为的指示下，梁启超于5月2日进一步动员在京的18省举人1300人，在明代烈士杨继盛的故宅松筠庵（今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12号）集会，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一套救国纲领。由于历史上将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称作“公车”，意即由公家车马包送入京，因此人们称这次举人的上书运动为“公车上书”。

这次公车上书，虽然因投降派的阻挠破坏，没有将请愿书呈送到光绪帝手中，但它打破了清代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揭开了近代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序幕。

公车上书后，梁启超继续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致力于维新运动，积极参加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兴办学堂等活动。1895年下半年，他一直留在北京协助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先后负责编辑出版《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争取北京一些士绅和开明官僚对维新运动的支持。1896年1月强学会遭清朝政府封闭后，梁启超应黄遵宪和汪康年的邀请，前往上海，参加《时务报》的创办工作。8月9日，《时务报》正式创刊，梁启超担任主笔，成为一名出色的宣传家。

在任主笔的1年多时间里，梁启超在《时务报》先后发表59篇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一文。该文共分13个小节，自创刊号登起，一直到第43期止。在这篇长文中，梁启超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这些基本思想出发，阐述了中国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他以历朝都曾改变前朝的法制等具体事例，把顽固派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改”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他警告清朝政府，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抗拒这个规律，当变不变，必遭列强瓜分，后果不堪设想。他还指出，变法不能再重弹“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滥调，不能只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变法的关键在于改变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

除《变法通议》这篇带有纲领性的文章外，梁启超还发表了《左议院考》、《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治论文，初步表达了要求以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愿望。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抨击中国历代封建君主为了个人专制，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弄得举国上下驯服惕息，静而不动，自以为得计，其实愚蠢之至，到头来落得个人无权，举国无权，国家败亡，人民涂炭。指出：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就在于它们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人人有爱国之心。他认为中国目前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从进化的历史观来看，由君权向民权过渡，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也不例外。

在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梁启超还利用报馆这一宣传阵地，热情支持社会各界的学会活动，先后为善医学会、蒙学会、农学会和知耻学会等撰写序文，宣传这些学会的意义，呼吁社会予以响应。如在《善医学会序》中，梁启超极言医学影响一个民族的兴衰，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表征，号召天下之人都来关心中国的医学事业，“大以救种族之式微，小以开艺术之新派，远以拯来者之急难”。在《农会报序》里，梁启超又力言农学为“治天下之第一义”，希望人们都来讲求农学。在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知耻学会所作的序文里，梁启超阐述了知耻图强的道理。指出要图强，必先从知耻做起，做到人人“自耻其死，无责人之耻，贤者耻大，不贤者耻小”，最终实现“人人耻其耻而天下平。”

在学会活动中，梁启超当时特别重视与妇女解放问题有关的社会活动。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歧视，以及强加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如妇女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观念，不但给妇女和家庭带来不幸，而且也给民族带来灾难。因此，他在1897年6月间与汪康年、康广仁、麦孟华等一道，在时务报馆设立戒缠足会，起草《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约定凡入会之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缠足者，如在8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9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希望借此消除放足妇女顾虑，革除缠足歪风。为扩大影响，梁启超还发表《戒缠足会序》一文，谴责缠足陋习伤天残人，贻害无穷。同时，梁启超大力提倡兴办女学，积极支持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学堂，专门在《时务报》上发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呼吁天下有志之士，都来重视女学，提出兴办女学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民族强盛的始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作的另一宣传，则是大力提倡引进西学。他曾编辑出版《西政丛书》32种，在《时务报》上予以介绍，其中特别强调西方

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指出欧洲各国，不是土地之沃、人民之颐、物产之衍有过于中国，而是他们的政治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优越。他批评中国近年来讲求洋务，不见效果，原因就在于忽视政学。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中，也强调该书局出版的译著，将“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在西学和中学两得之间的关系上，梁启超既反对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西学，同时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中西并重，新旧融合，既不可舍西学而言中学也不可舍中学而言西学。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梁启超为宣传变法维新所写的这些文章，不但议论新颖富有说服力，而且文字也十分明快流畅，通俗易懂，深受一般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官僚的喜爱。《时务报》也因此取得巨大成功，发行后不久销售量即达1万余份，成为戊戌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而随着《时务报》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梁启超也名声鹊起，成为当时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从那时起，人们说起康有为，总要连带提到他，把他们合称为“康、梁”。

1897年冬，梁启超又因黄遵宪、谭嗣同等的邀请，离开时务报馆，前往长沙，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协助谭嗣同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梁启超在长沙前后共5个月，1898年3月因病离湘返沪。在回上海的舟行途中，他回顾三年来维新运动的风风雨雨，与同事们慷慨相约道：“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因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这段掷地有声的话，表达了青年梁启超以身许国的坚定信念。

五、北上参与变法

自1895年维新运动开始以来，梁启超一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受德国强租胶州湾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的刺激，1898年北京再度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梁启超又于这年3月，在康有为的指示下，北上进京，共襄变法大业。

当时北京的形势就像3年前公车上书时一样，又是3年一度的大考日子，各省举人云集。梁启超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后，顾不得休息，连连发动3次公车上书，为变法维新大造声势。他发动的第一次上书是反对俄国强租旅顺、大连。3月27日，梁启超与麦孟华、龙应中等一道，就康有为口授的内容，联合两广、云贵、山陕、江浙等有志之士百数十人，上书都察院，警告清政府如屈从帝俄压力，割让旅大，各国列强必争相仿效，中国将必亡无疑。吁请清政府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不但不能轻易答应俄国的侵略要求，而且要发愤变法，力求自强，只有这样，国家的前途才有保证。

梁启超组织第二次上书，是抗议德国兵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内的孔孟塑像，即所谓山东“即墨案”。这件事发生在戊戌正月初一日，阳历1月22日。这一天，有几名德国兵闯入即墨县的文庙，任意侮辱、毁坏供奉在庙内的孔孟塑像，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慨。三个月后，来北京参加会考的孔孟后裔孔广蕃、孟昭武等17人和山东举人103人，同时上书都察院，要求清政府处理这件事情。梁启超闻讯后，立即抓住这一时机，鼓动其他人士参加这场爱国运动。5月6日，梁启超与麦孟华一道领衔动员830名广东举人，上

书都察院，要求清政府与德国政府交涉，查办毁像之人，并予赔偿。指出这次德国兵公然毁坏先圣贤之像，分明是无视中国主权，蔑视孔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作出反应，只能助长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略。梁启超组织的这两次上书请愿，极大的激发了举人们的爱国情绪，宣传了变法御侮的思想。

梁启超组织的第三次上书是吁请改革科举制度，这也是3次上书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次。5月间，梁启超联合在北京会试的100多名举人，将《请变通科举折》送呈都察院，建议1898年会试之后，停止八股取士制度，推行经济六科。梁启超在上书中提出废除八股的理由是，八股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脱离实际，不能培养出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梁启超特别强调指出，在中国尚未与外洋通舰，也没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八股取士制度的危害还不是很严重，但在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飞速发展，并互相竞进的时代，如果中国还继续拿八股去束缚毒害读书人和天下百姓，那就等于是自取灭亡。梁启超的这次上书虽然遭到一大批举人的强烈反对，但它却为不久后百日维新期间废除科举制作了舆论准备。

除发动3次公车上书运动之外，梁启超同时还辅助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保国会是戊戌维新期间一个全国性的以“保国”、“救亡”为宗旨的学会团体，它于4月17日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参加保国会的有维新人士和爱国官员200多人。4月21日，保国会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面对百余名情绪激昂的爱国志士，梁启超一跃登台，发表了动人心弦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一面陈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但同时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中国已无可作为的悲观论调进行严厉的驳斥，指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他说：“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民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梁启超这番话，给爱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经过整整一个春天的紧锣密鼓的活动，到初夏时节，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终于迎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日子。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在他们的影响和翁同龢等一批帝党官僚的支持下，同时也为了改变自己无权的状况，发布诏书，宣布自即日起实行变法，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自6月11日至9月21日的103天，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一个高潮，也是维新派最活跃的日子。在这一百多天里，虽然由于后党保守势力的阴挠，梁启超未能象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那样，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进入策划变法的核心班子，但他仍力所能及地参与变法活动。7月3日，梁启超在晋见光绪皇帝时，特别强调开办学校，引进西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积弱不振，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人民闭塞，读不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书籍，不了解天下大事。要改变这种愚昧不开化的状态，一是开办学校，让学生学习新的知识，二是将西洋书翻译过来，供人们阅读吸收。二者都很重要。但对当前扫除弊政、实行改革来说，翻译书籍尤为当务之急，因为学校为培养人才之地，主要供青少年就读，不适合于社会上的成年人进校学习。要提高这批人的现代文化素质，只有让他们通过阅读译著来实现。光绪皇帝听了

梁启超的这番话后，觉得很有道理，便立即发布上谕，赏给梁启超六品卿衔，专门负责译书局事务。召见之后，梁启超便全力做好译书局工作，拟定译书局章程 10 条，并上书光绪皇帝，增拨经费，设立编译学堂，准予编译学堂毕业生学生身分（按照科举制度，学生皆要由学政考试取得学级资格，才能毕业，而一般学生没有学级）。对于他在变法期间所办的这件事，梁启超后来在《戊戌政变记》里认为是“4000 年之创举”。

梁启超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多，但在后党反动势力阴谋发动政变、镇压维新运动时，梁启超又挺身而出，站到前台。9 月中旬，在得知慈禧太后将发动政变的消息后，梁启超立即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康广仁等一道筹商对策。他极力劝说康有为赶快离开北京，主张由他本人和康广仁等留下来谋救光绪皇帝。9 月 21 日，就在政变发生的当天，梁启超还在白色恐怖中，与谭嗣同一道开展救援活动。这天午后 2 时，梁启超根据谭嗣同嘱托，来到日本公使馆，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提出援救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请求，至于他本人，梁启超表示“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说完，他便匆匆离开日本使馆，找到李提摩太，将北京的情况电告他在上海的同志，并托李提摩太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援救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一行动，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后来就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保护下，逃过清兵的追捕，来到日本。

对梁启超来说，求救于李提摩太和日本使馆，这是他在政变发生后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当时的北京城已是缙骑四出，城门紧闭，梁启超从李提摩太那里出来后，就再没有安身之处。入夜后，他即遭到清兵的追捕。无奈之中，梁启超只好再次逃入日本使馆避难。在日本使馆人员的帮助下，梁启超化装成打猎人的模样，由刚好来北京办事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护送，连夜前往天津，登上停泊在塘沽口外的日本军舰，东渡日本，开始 14 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六、舆论界的骄子

戊戌政变挫阻了中国近代自上而下改革的通道，但梁启超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他在痛定思痛之余，认为中国要改革，首先还是要从教育人民做起，补思想启蒙的课。因此，他到日本后，除参与组织保皇会，发动自立军起义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办报上。

梁启超到日本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是《清议报》。该报在旅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的资助下，于 12 月 23 日在横滨正式出版，10 天 1 期，每期 40 页。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宣传的内容，比在国内时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一方面在报刊上大力宣传民权理论，介绍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社会学说，大胆批评中国人民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奴性、愚昧、好伪、自私、怯懦、好静等国民劣根性，号召人们树立冒险精神，树立独立和合群思想。在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梁启超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呼吁中国的年轻一代克服老大帝国的衰颓，努力创造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年中国。他的这一呼吁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共鸣，从此之后，“少年中国”一词便被广泛用开了。

与此同时，梁启超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公开进行猛烈抨击。他痛斥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一批后党官僚是一伙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逆

后贼臣”；攻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阻挠变法，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使得中国的大好河山和4万万百姓“一并断送于其手”，宣称西太后把持的清政府完全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伪政府”。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吓得国内的慈禧太后和后党官僚胆战心惊。他们将梁启超看作是比孙中山更危险的革命分子，于是发布通缉令，以10万重金悬赏捉拿梁启超和康有为，并严禁国内人士阅读和贩卖梁启超的著作和所办刊物。

1901年12月，《清议报》因遭火灾停刊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创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每半月1期。梁启超之所以将刊物取名为“新民”，他的意思就是要用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权利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等观念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把中国封建社会下的臣民改造成一代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国民。

为实现这一目标，梁启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历史地理。在1902年的一年里，梁启超发表专门介绍西方思想家学说的文章就有《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多篇。此外还有多篇西方人物传记、西方地理、西方小说。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丛报》介绍的西方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多达百人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学史等，几乎无所不有。例如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培根的方法论，笛卡儿的怀疑论，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约翰·弥尔的自由论，波伦哈克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直到马克思学说，梁启超都作过深浅不同、详略不等的介绍。梁启超还在报中开设“新知识之杂货店”、“介绍新著”、“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等栏目，专门介绍国外新知识、新书刊、新消息。在当时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刊物中，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独占鳌头。

在介绍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梁启超还对中国传统旧学进行改造，提出学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在学术思想领域，梁启超主张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制。他说：“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而皆然者也。”他在《新民丛报》上连刊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洋洋7万余言，首次撇开封建纲常名教思想和儒家正统观念，打破学派门户之见，对先秦诸子学、佛学及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及长短得失作了概括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并注意到学术思想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各派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乃至中外文化交流，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胡适当时读了这篇文章，认为它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自《新民丛报》第一号起，就连载他的《新史学》一文，“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他说，史学是学问中最博大而最切要者，是“国民之明镜”，“爱国之心源泉”，与国家民族的发达最有关系。但中国以往的史著却存在诸多弊端，譬如只知有朝廷则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结果

将中国的史书弄得难读难解，不易使人生感动。中国史学外貌极发达，但对启发民智、鼓舞民心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严厉抨击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中心，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摘成为帝王“二十四姓之家谱”，无休无止地进行所谓的“正统”与“闰统”之争，为专制独裁自私其国服务，同时煽扬民族的奴隶性，贻害无穷。梁启超主张新史学应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为宗旨，“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为此，梁启超身体力行，在当时就用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撰写出多种专题史和人物传记，为新史学的成立做了开榛辟莽的工作。

在文学领域，梁启超在1898年《清议报》第1册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里，就对中国旧小说作了总体批判，提倡翻译“外国外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的“政治小说。”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后，他从第2号起，就专辟“小说”一栏，长年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殖民伟绩》等文艺译作和创作。在1902年的1年里，《新民丛报》共刊出6篇小说，其中5篇是以西方国家的人物故事为题材，内容都是有关那些国家或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和青少年，如何为国家、为民族、为追求自由、平等的新生活，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英勇事迹。同年冬，他又在日本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新小说》，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第一次将历来被人们视为文章小道末技的小说，提升为最有文学价值又最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艺术，呼吁文学作品必须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努力避免流于诲盗诲淫，或为“尖酸轻薄毫无取义”的游戏之文。同时，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学，指出由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这是文学史的一个普遍发展规律，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的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对于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倡导新体小说之后，写小说、读小说，蔚然成为一代之新风。一时之间，《小说林》、《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等文学刊物接踵而至，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传统偏见。

梁启超在《清议报》时代和《新民丛报》头两年里所写的文章，通俗易懂，恣肆汪洋，充满感情，不但与他政治立场相同的人喜爱它，称颂它，即使政治立场与他不同的人也爱看他的文章，承认他的文章别有一种“魔力”，“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胡适语）。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回忆1902年求学的情景时，就说自己非常爱读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中，毫不讳言他青年时代对梁启超的崇拜，说自己曾对《新民丛报》喜爱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读了又读，直至可以背出来。”郭沫若在谈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时，对梁启超的宣传也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梁启超在1899—1903年间所作的启蒙宣传，对中国近代的贡献极大，不但对当时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整整影响了从邹容到毛泽东两代先进的中国人，其意义远远超出他的政治活动，是他一生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人们尊敬的称为“舆论界的骄子。”

七、立宪运动的领袖

1905年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受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结局的刺激，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甚至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认为日本之胜是立宪政治的胜利，俄国之败是专制政治的失败。因此，他们主张中国仿效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想借立宪之名以削减革命党人的威胁，于是，于1905年7月作出决定，准备派遣载泽、端方等5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诏书，宣示预备立宪。

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政治，是梁启超自戊戌维新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他在日本读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上谕后，欣喜异常，认为这是重新进行政治改革的大好机会。在此后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中，梁启超把他的精力主要就放在领导这场希望和幻灭并存的在政治运动上。

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最后公布了慈禧太后裁定的新官制方案。但这一方案除了更新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新增一个邮传部外，对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作任何实质性的变革。立宪派关心的责任内阁，连提都未曾提到，预定设立的资政院也是遥遥无期，而对于涉于皇室及满族亲贵利害的衙门，明确宣布不予更动。这使海内外的立宪派大失所望。梁启超更从中认识到不能将立宪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于是便着手酝酿成立新的政治团体，以推动国内宪政的实现。12月，梁启超邀请戊戌时代的老朋友熊希龄和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很有名气的杨度来日本，筹商组织政党的办法和宗旨，初拟会名为宪政会，计划争取张謇、郑孝胥、汤化龙等3个国内立宪派首领入会，推杨度为会长。但后来由于国内立宪派首领无意与梁启超合作，杨度也在领导权和政见上与梁启超产生分歧，另树一帜。这样，梁启超只好放弃最初的宏大计划，在与党内同志商量后，于1907年春决定单独组建政党，取名为政闻社。梁启超为政闻社制定的立宪纲领是：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独立；三、确定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10月17日，政闻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会上作题为《政治上之监督机关》的演说，强调改良政治，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关，这个机关必须“由选举而成立，非由任命而成立；必当使其权力之渊源在人民，而不在君主。”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未开放党禁，梁启超仍是清朝的通缉人物，为不影响政闻社的活动，梁启超本人并不在政闻社出名，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人也由蒋观云挂名，梁启超居幕后领导。

政闻社成立后，梁启超积极派社员回国，分赴北京、东北、上海、湖北、江西、四川、福建、广西等地，进行发展社员及要求速开国会活动。为扩大本社在国内的影响，梁启超经与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商量，于1908年2月将政闻社总部由日本迁往上海，由马相伯、徐佛苏主操上海总部事务。7月，在各省国会请愿高潮中，政闻社也以该社全体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指出：“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除祸乱，难系人心。”在此前后，还派归国的政闻社社员联络各地立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速颁宪法，早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而更使清政府感到难堪的是，就连旗籍士民也被鼓动起来。1908年8月，与政闻社关系密切的《大同报》社的一些旗人，带头呼号，发起八

旗国会请愿。国会请愿运动引起清政府的严重不安。为杀一儆百，清廷于 8 月 13 日以“阴谋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宣布查禁政闻社。

政闻社被取缔后，梁启超作为海外立宪派的领袖，并没有因此心灰气馁。相反，他鼓励党内同志坚持斗争，坚持立宪救国的坚强决心。

经过 1 年的养晦待时，1910 年随着国内立宪运动的重新高涨，梁启超也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国民立宪运动。1910 年 2 月，他在上海创办宪政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国风报》，先后发表文章 100 多篇，给清末立宪运动以有力的指导和推动。

鉴于当时许多人对立宪政治似懂非懂，存在大量误解，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对宪政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立宪政体必须贯彻三权分立原则，君主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君权是否有限；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中，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为立宪政体的象征和标志，“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政。”至于国会的组织、职能和性质，梁启超在详细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国会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国会制度的具体方案。他建议中国应实行两院制，即充分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又调和各方面的利益。议员的产生，必须贯彻主权在民原则，以民选为主，兼采他法。至于国会的职能，梁启超极力主张赋予国会以最充分的权力，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七权：一、参与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设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他强调，“此种职权苟缺其一，即不成为国会”，批评清政府颁布的《资政院章程》规定资政院不得参与制定宪法，没有单独具奏权，议员个人对政府无质问权等等，都是违背立宪根本精神的，“与各国议院共通之原则太相刺谬”，是“徒取外国之法文东涂西抹，苟塞篇幅而已”。

在主持《国风报》的日子里，梁启超还为国会请愿运动大造舆论。在 1910 年全国性的国会请愿高潮中，梁启超先后发表《国会期限问题》、《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和《为国会问题敬告国人》等文，极力宣传速开国会的主张，断言“中国而欲有国会者，惟开设于宣统四五年以前为能有之。过此以往，吾中国永无开国会之时矣。”驳斥清政府以人民程度不足或程度不齐为借口拒绝召开国会为站不住脚的，指出物之不齐，乃物之常情，无论政权如何修明，要求人民程度悉归于一是不可能的；至于我国人民的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固然存在不足，但与本国政府官吏相比则无所谓不足。他一针见血地揭露清政府反对速开国会的真正用心，是为了维护当权者的自身利益和特权，逃避监督。

除舆论宣传外，梁启超也在国内立宪派中开展组织活动。在 1909 年各省筹备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期间，梁启超就指示在国内的代表徐佛苏与各省谘议局议员联络，鼓动他们促使清政府加快立宪进程。1910 年，国会请愿运动高潮迭起，梁启超更是精神大振，指使徐佛苏与国内立宪派活跃分子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等“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7 月间，又积极支持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为《国民公报》撰写文章，并募款帮助报馆，使《国民公报》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一个大本营。11 月间，当清政府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 9 年缩短为 5 年，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派与清政府妥协，退出国会请愿运动后，梁启超仍持激进态度。他一方面建议徐佛苏、孙洪伊等在国会请愿同志会解散后组建新的团体，拟在国会成立后充任政

党，这便是 1911 年 6 月初国内成立的宪友会，另一方面鼓动徐佛苏、孙洪伊等人继续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迫使清政府早日实行宪政，梁启超甚至公开号召国内反对清政府的各个政治派别捐异存同，互相提携，一起来对付清朝政府，建设一个新的良善政府。

梁启超领导的立宪运动，走的虽然不是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但立宪运动从本质上来说仍不失为一场进步的历史运动，它最终的目的是要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并且，立宪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在当时不但宣传了资产阶级宪政思想，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真面目，从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八、护国功臣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却很快被反动的旧军阀袁世凯篡夺。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不但废除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象征的《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且冒天下之大不韪，在 1915 年公然背叛民国，宣布实行帝制。这样，中国人民便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梁启超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运动，而且还是重要的筹划者和领导者。

历史上，梁启超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非同一般。17 年前，正是袁世凯在关键时刻卖友求荣，最后导致戊戌变法功败垂成，维新志士流落海外。7 年前，清政府下令查禁政闻社，又是袁世凯从中助纣为虐。民国初年，梁启超则因政治需要，捐弃前嫌，一度拥护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希望通过袁世凯把中国政治引上轨道。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逐渐暴露，梁启超开始渐渐疏远与袁世凯的关系，1914 年底辞职避居清华园和天津，宣布脱离政坛，专事撰述。此后，梁启超多次以下属和知己的双重身份，规劝袁世凯切勿颠覆民国，以帝制自为。1915 年 8 月 14 日“筹安会”正式出笼，公开为恢复帝制鸣锣开道。这时，梁启超便义无反顾地与袁世凯决裂，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者》一文，在舆论界率先打出反对帝制的旗帜。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暗中与学生蔡锷积极筹商军事反袁的计划，指示蔡锷秘密联络云、贵的军队和各省反袁势力，准备武装起义，并草拟好有关起义的通电和文告，巧妙安排蔡锷逃出北京。12 月 18 日，梁启超本人也在蔡锷抵达昆明的前一天到达上海，领导南方的反袁护国运动。

梁启超刚到上海即接到有关情报，说袁世凯将以向日本天皇赠勋为名，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争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为粉碎袁世凯的这一阴谋，梁启超立即通过冯国璋的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致电唐继尧和蔡锷，指示他们提前发动起义。12 月 22 日，蔡锷、唐继尧接到电报后，连夜召集云南重要将领，等商起义大计，宣布反袁护国战争开始。在接着的两个月里，梁启超在上海运筹帷幄，策划和制订反袁的各项方针和步骤。在云南方面，梁启超曾多次致电蔡锷，就有关治军作战、财政外交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在军事上建议蔡锷以四川为主攻目标，在进军过程中要对各军采取分化政策，同时注意扩充护国军队伍，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密切官兵感情，对广大官兵的训练和教育，“不能专重于技术而当尤注重于精神。”财政上，梁启超建议护国军接管由洋人管理的盐税，一则可以得大宗收入，二则使袁世凯

政府的财政陷入困难，并损害其对外信用，促其自毙。当广西和东南各省没有及时响应云贵独立，蔡锷在前线遇到挫折，出现畏难情绪时，梁启超又立即去信，勉励他们不要“缘此而稍有懊丧，天下事惟求诸在我而已。凡人若只能听好消息，不能听恶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须知我辈当此万难之局，而毅然以自身许国，岂为高兴来耶！将来所遇困难，失意之事，应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则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败事矣。”鼓励他们知难而进。

在上海期间，梁启超还积极争取中外各方对云南护国军的支持。在外交方面，梁启超重点争取日本的支持，曾在上海与日本派来驻沪的武官青木中将多次晤谈接触，希望日本在饷械方面给予援助。在国内方面，梁启超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对于长期交恶的革命党人，他此时捐弃前嫌，争取联合态度，不但自己对民国初年排斥革命党人的行为公开认错道歉，而且写信给他的学生蔡锷，要他也吸取教训，不要再抱有党派之见，为袁世凯所利用。同时，梁启超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矛盾，向坐镇南京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做思想工作，促使他对护国军持中立和同情态度，拒绝接受袁世凯征滇总司令的任命。为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贵独立，3月4日，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逃过袁世凯派来的密探的监视，弃笔从军，亲自启程前往广西。在梁启超的运动下，陆荣廷也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这一举动给袁世凯以重大打击。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知大势已去，便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于22日发表申令，宣布取消帝制。至此，护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梁启超在广西人民的热烈欢迎下，于4月4日抵达南宁，迎接新的战斗。

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目的是藉此要求南方护国军也取消独立，保住他的总统职位。对于袁世凯提出的这一停战议和条件，梁启超坚决反对，他在来广西的途中就分别致电广西将军陆荣廷和云、贵都督及前敌各总司令，一再要求他们统一认识，决不要接受袁世凯的这一议和条件，一定要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逼袁退位。为使中外人士彻底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通电，说明逼袁退位的必要性。梁启超指出，袁世凯决不是什么政治家，而是“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是一个阴险奸诈的窃国大盗，是“天下古今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是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让这样的人统治中国，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为达到逼袁退位的目的，梁启超积极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进军湖南、江西。他一再告诫护国军各将领，与袁世凯和谈，一定要以武力为后盾；和谈的条件，必须以袁世凯退位为前提，在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之前，决无磋商余地。为尽早出兵北伐，梁启超到达南宁后，改变原来驱逐广东都督龙济光的决定，接受陆荣廷的建设，与龙济光的“济军”妥协，呼吁攻打广东的各路民军停止进攻。5月5日，梁启超与李根源等一道深入虎穴，亲至龙济光军中，以热诚说动龙济光共同出兵北伐，逼其发表“团结一致，专心北伐”的通电。5月8日，梁启超又在广东肇庆组织成立军务院，声明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宣布袁世凯因犯判国罪，自1915年12月13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取消”，并通告全国公使、领事、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这样，军务院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袁世凯政权。不久，护国军便在军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的军事讨伐，终于实现了梁启超北伐讨袁的军事

部署。

梁启超在逼袁退位中，还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袁世凯，梁启超对北洋军阀采取分化政策，极力争取中间力量站在反袁一边。当袁世凯取消帝制，国内一些有影响人物，如康有为、唐绍仪、伍廷芳和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作为调和人，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取消独立时，梁启超一方面号召护国军方面统一立场，不要轻易言和，积极组织北伐；另一方面为揭穿袁世凯和谈阴谋，他建议护国军方面提出袁世凯肯定不会接受的五个条件作为停战和谈的前提，以此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在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后，梁启超又利用段祺瑞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致电段祺瑞，陈明利害，促其加入逼袁退位行列。对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另一位大将冯国璋，梁启超也继续采取拉笼政策。冯国璋为发展自己势力，提议停战议和，组织未独立各省召开南京会议。梁启超就此多次与冯协商，表示愿意合作，但同时坚持必须以去袁为前提。梁启超对冯国璋所采取的这一灵活政策，使袁世凯试图通过北洋军阀攻打南方护国军的阴谋最后也没有得逞。5月30日，冯国璋因与北洋军阀中的张勋、倪嗣冲等人意见不一致，宣布调和失败，解散南京会议。过了6天，袁世凯便在众叛亲离中气绝身亡，护国运动也就此结束。梁启超则因在护国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人们称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九、力争山东主权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日子。这天，北京的3000名大学生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我等口号，抗议巴黎和会把我国的山东主权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远在海外的巴黎。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但他的心却与广大爱国青年息息相通。为收回山东主权，梁启超与全国人民一道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山东，是我国北部的一个临海省份，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部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测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有适宜于建设军、商港口的良好地势。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山东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对中国的侵略。9月，日本即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占领青岛。对于日军的这一侵略行径，梁启超带头在政府内提出抗议。10月2日，梁启超在参议院第15次会议上提出“紧急动议”揭露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是破坏我国主权，目的决非占领胶州一地，而是要把整个山东变为“第二之东三省”。他强烈要求袁世凯政府必须就山东最新形势的发展与日交涉，切实保护山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中国主权。

对于梁启超带头反对日本侵略我国山东，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恼怒，他们骂梁启超“忘恩负义”。但梁启超则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决不会因曾受日本政府10多年的庇护而背叛自己的祖国，放弃对于国家的责任。梁启超这样反问道：“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10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

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

1915年初，梁启超又不顾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利诱，积极参加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他先后在杂志上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交涉乎，命令乎》等文，揭露日本政府所谓的“维护东亚之和平”，出兵中国，无非是趁欧美无暇东顾之机，独占中国。他劝告日本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指出夺人国者到头来必然以失败告终，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是根本办不到的。同时，梁启超也告诫袁世凯政府切勿为祖国罪人，承诺日本的侵略要求。

1917年初，看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呈现出败势，为使中国战后能够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梁启超坚决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交、宣战。他在分析战后的形势后正确指出，参战是中国跻身国际社会，增强国际地位的一个大好机会，欧战结束后，各国将来的命运，大半将由各国在和平会议上的席位决定，我国将来列席和平会议，能多大程度保全中国主权虽不得而知，但如不参战，我国战后肯定会被摒除在和平会议之外，这样，我国的命运就将完全由他国处置决定，后果不堪设想。为对德宣战，梁启超不但与汤化龙、蔡元培、刘彦、张君勱等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宣传对德宣战的意义，而且卷入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与段祺瑞合作，推动中国对德宣战这一外交政策的实现。1917年8月14日，梁启超亲自为段祺瑞政府起草对德宣战书，并在宣战书上署名。这样，便为后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18年欧战结束后，梁启超这时虽然离开了政坛，便仍十分关心中国在和会上的命运。他一方面为北京政府在和会上所提各项要求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又以一个社会名流的身分，多次拜访英、美、法、日驻华公使，呼吁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在与日本代理公使宫泽的谈话中，梁启超沉重提出日本应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前往欧洲游历，除考察西方文化外，他的另一个重要使命，也就是要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分，在和会上申诉中国的“冤苦”，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作外交后援。

在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在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上，的确起了中国外交代表不能起的作用。1919年2月梁启超刚到巴黎，就将他在旅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译印成英法文，广为散发，申明中国在这次和会上的基本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胶州湾、青岛及山东路矿应一并由德国归还中国，指出只有公正解决中国问题，世界和平才有真正可言。此后，围绕山东问题，梁启超在许多场合重申中方立场，争取欧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针对日本以对德作战有所牺牲为借口占据山东，梁启超专门在巴黎《时报》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义正辞严地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藉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在一次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又就山东问题慷慨陈词，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宣告：“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这番演讲，四座为之鼓掌，弄得当时在场的五名日本记者极为狼狈。

对此，日本政府也十分恼怒，便在舆论界制造谣言，无中生有，把这次宴会说成是由中国当局私下运动出来的。

作为巴黎和会的民间代表，梁启超还与国内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将和会情况报告国内，鼓动国内人士敦促北京政府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坚定立场，支持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斗争。3月11日，梁启超将段祺瑞政府去年9月与日本私订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主权交涉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致电国内外交委员会委员汪太燮、林长民，指示他们在国内采取补救行动，取消密约。4月24日，也即巴黎和会正式决定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前六天，梁启超又将这一消息及时报告国内，要求发起拒签对德和约运动。国内的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在接到电报后，即根据梁启超的意思，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5月2日在《晨报》头条位置，以“代论”形式发表。林长民的这篇文章写得极富煽动性，一开头就发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警钟，说：“此恶耗前二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各政团和组织纷纷召开会议，力图补救。5月3日晚，北大学生1000多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外交失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由是爆发。

由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以及与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安福系，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诬蔑梁启超接受外国贿赂，卖国求荣；指责梁启超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闹学潮，等等。他们甚至在国会内提出“弹劾案”，要求惩办梁启超。但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梁启超的爱国立场。1920年春，梁启超回到国内后，致书总统徐世昌，肯定“五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释放被捕青年学生。同时，针对当时国内流行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说法，梁启超一再发表意见，呼吁北京政府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必须坚定立场，决不可与日本直接进行交涉，否则，拒签和约的努力将前功尽弃。在中国人民长期不懈的斗争下，山东问题终于在一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解决。

十、献身文化事业

在梁启超生活的最后10年，即1918—1929年，既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10年，也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这10年里，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17年就在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涨之际，梁启超于这年的11月辞去在段祺瑞政府中的任职，彻底脱离从政生涯，转向学术活动，决定走文化救国的道路。第二年底，他又前往欧洲游历，详细考察西方文化。1920年春回国后，梁启超便全身心地从事各项文化事业活动。

梁启超所从事的第一项文化活动的组织创办共学社，成立讲学会，推进中外文化交流。1920年3月梁启超到上海后不久，就来到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高梦旦、陈叔通等商议成立一个学术团体，组织学人著译，出版一套新知识丛书。4月，梁启超即在北京与蒋方震、张君勱、张东荪等一道正式组织成立共学社，推动著译新书，奖励出版专著。在1922年一年里，共学社就出版共学社丛书40余种，前后总计起来，不下百余种，共分时代、教育、

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传记、史学和俄罗斯文学等 10 类。同年 9 月，梁启超又在北京与蔡元培、张元济、蒋梦麟等 20 人组成董事会，成立讲学社，先后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华讲学，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在讲学社会带头下，此后邀请国外学人来华讲学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

梁启超归国后的另一文化活动中是承办学堂，其中花费精力最大是改造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原为收容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的归国学生而设，成立于 1906 年，梁启超于 1920 年接办公学后，即努力扩大公学规模，着手将公学改为大学，并增办图书馆。为解决学校的经费困难，梁启超想方设法向社会各界募捐，他本人也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 1000 元稿酬拿出来，赞助公学购买土地，建造学舍。在梁启超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公学不但得到维持，而且有所发展，到 1927 年国民党接收时，中国公学前后为社会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除接办中国公学外，1926 年秋冬，梁启超又应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王宠惠和司法总长罗文干的聘请，筹办司法储才馆，为中国准备收回领事裁判权，培养本国司法人才。1927 年 1 月，司法储才馆正式开学，首届招收学生 220 多名，梁启超任馆长。此外，梁启超在 1923 年初还曾发起创办文化书院，以弘扬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但这一计划因经费问题，最后没能实现。

梁启超晚年在文化事业上所做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为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20 年欧游归来后，梁启超就着手将原设在上海的松社移至文化中心北京，以松社已有的 6000 余种中外文图书和民国政府拨给的杨守敬旧藏的 2.4 万余册中文古籍为基础，正式向政府申请创办松坡图书馆。1923 年 11 月，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自任馆长，另任命蒋方震主持总编辑部，蹇念益（季常）主持总务部。为维持松坡图书馆的日常经费和购书费，梁启超一方面向社会募捐，另一方面他每月拿自己卖字得来的钱添补经费，将松坡图书馆建成为当时国内一所颇具规模的私立图书馆。1925 年他又应负责管理美国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政府教育部的聘请，出任基金董事会和教育部共同筹办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在任馆长期间，梁启超四出奔走，落实经费，并十分重视北京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和藏书建设。到 1929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故此时改称北平图书馆）建立时，总计购置中文书籍 8 万余册，西文书籍 3.5 万余册，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奠定基础。并且，梁启超在病逝之前，还口头定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全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最后一份贡献。在此期间，梁启超还积极支持成立中国图书馆协会，为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协会董事会的首席董事。为表彰梁启超在发展中国图书馆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美国耶鲁大学在 1927 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曾三度电请他亲领，但梁启超因病始终未能成行。

除从事上述这些社会文化事业外，梁启超晚年将另一部分精力则花在大学的讲坛上。梁启超晚年的讲学，以清华学校为主。1920 年 12 月，经过一段时期的沉重考虑，他最后决定来清华授课。1 年后，即被正式聘请为清华学校的讲师。从此，梁启超便以清华的一员，与清华的教育事业紧紧连在一起。除授课外，他还不时地就清华学校的校务及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曾建议学校董事会应由中美两国教育家联合组成，学校的组织最好以教授团为主体，校长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由各级教授轮流担任，强调清华

学校的校长应该是“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他建议清华的教育不能停留在模仿裨贩、引进欧美学问上，而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学问。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梁启超又应聘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任国家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发展打下基础。除清华外，梁启超晚年还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天津等地的许多学校讲过学。

在讲学过程中，梁启超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不但向学生讲授有关历史和文化知识，而且循循善诱，传授治学方法，教导如何做人。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们在学校时必须养成读书习惯，否则，“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终身幸福”。他提醒同学们在学问上要注意博、约结合，指出学问知识由普通知识和专门知识两部分构成。求普通知识，应采取如飞机上观察，凌空鸟瞰；求专门知识，则要进行显微镜式的研究，注重精细。他建议同学们在进行专门研究时，应先掌握普通知识，指出：“研究学问的人，每天应以三分之二的时间作专门的工作，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做涉猎的工作，最少也应以四分之一的时间涉猎。如此涉猎，才得到充分的常识。”同时，梁启超还常常鼓励同学们要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和意志的磨炼，做到不忧、不惧，知行合一，勇于改正缺点，立志要高。他一再勉励同学们要立志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指出求学的目的，除培养个人的智能和人格外，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尽力。

讲学之余，梁启超又潜心学术，著书立说，创作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律、教育、宗教等诸多学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在最后的10年里，梁启超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每年的著述量平均近40万字。他创作《清代学术概论》洋洋六万余言，约用了一周时间，就把从明末到民国初年的200多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交待得清清楚楚；他撰写的《陶渊明年谱》，也是3日而成；《戴东原先生传》和《戴东原哲学》，是他一连24个多小时不睡觉赶写而成。梁启超晚年著书，就是这样经常夜以继日，日以继夜。1928年，他在病中仍坚持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直至旧病复发，再次被家人送进医院。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实践了他生前所说的：“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誓言，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

